

# 宋代经学诠释 与思想演进

姜海军 著

京师史学书系

京师史学书系

# 宋代经学诠释 与思想演进

姜海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经学诠释与思想演进 / 姜海军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3

(京师史学书系)

ISBN 978-7-5201-2409-6

I. ①宋… II. ①姜…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Z126.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8749 号

京师史学书系

## 宋代经学诠释与思想演进

---

著 者 / 姜海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张倩郢

责任编辑 / 张倩郢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23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409-6

定 价 / 12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宋代继汉代之后迎来了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宋代经学的兴盛，不仅表现为经学注解文献的数量庞大，还以其思想上的突破，实现了经学范式上的转换，亦即从汉学进入了宋学。随后，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经学解释基本上沿着宋学范式来进行，并对中国乃至东亚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学范式作为一种经学解释的范式，其实也是一种思想体系，这种经学体系的内涵不仅体现在对经书的认知与理解上，还反映在系列的解释方法之中，比如以史证经、理学解读儒经、探究性与天道、兼采众长等等，更为主要的是，宋儒借助经学注解的形式来重新认识并建构他们对宇宙人生、社会政治的思想体系，并进而形成了一套指导社会政治的新的“治道”。换言之，经学是宋代理学的基础，更是其思想表达的重要形式，所以无论是宋代的儒者，还是政治人物一般都会以引经据典、寓作于述的形式来表达或建构自己的政治理念，这一点无论是欧阳修、二程、朱熹、陆九渊，还是范仲淹、王安石等皆是如此。经学解释的现实取向性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毕竟，作为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士阶层，经学不仅是其政治理念表达的重要形式，更是其实现身份意识、追求不朽的重要方式。

关于宋代经学范式的转换，前贤时哲研究甚多，有关宋代经学及思想的研究者也甚多，只不过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盛行，以哲学史、观念史的视野来解读宋代经学成了基本模式。实际上，在宋代经学解释之中，探究“性与天道”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却不是他们为学的最终追求与基本宗旨。毕竟，儒学从产生之日起，明道、传道与行道便成了儒

者身份的基本意识，由此经学解释的现实指向性颇为明显。所以，不管是在汉代、宋代，还是在清代，儒者始终将这三者视为为学、立身的根本任务。正因如此，我们在探讨宋代经学及其思想的时候，多注重从历史的视野出发，以思想史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将经学研究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希望能够实现对宋代经学传承、诠释与思想建构的情况予以客观而清晰的揭示。

具体而言，在宋代经学传承、诠释与思想建构的历程中，尽管宋儒一般都注重义理思想、事功治国，并关注心性理命之学的形上问题，但实际上无论是王安石、程颐、朱熹，还是陆九渊、魏了翁、王应麟等人都很重视章句注疏之学。也就是说，经学的语文学考察是理学、心学与事功之学建构的学术基础，也是其理论存在与流传的可靠保证，这也是其明道的重要方式之一。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不能不关注宋儒对章句注疏之学的重视。不仅如此，随着雕版印刷术在宋代的大兴，使得宋儒比汉唐诸儒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经籍，由此促成了他们思想的勃兴与多元，并开始跳出门户、师法的局限，注重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也就是说，宋儒在明道的同时，注重传道，而传道本身依旧没有离开对师法、家法与传承谱系的重视，或许这也与当时佛教的法统有一定的关联。宋儒对于知识谱系的关注，在《宋元学案》所作的师承谱系中就有清晰的反映。在宋代，不同的学派一般都有不同的经学理念、解经方法及政治理念等，所以，我们在研究宋代经学及思想的时候，需要面对王学、蜀学、朔学、关学、洛学、湖湘学、闽学、婺学等各个经学流派的师承关系及内在的思想特质。换言之，对宋儒经学学术史的考察或曰对传道谱系的梳理，也是宋代经学及思想研究的重点所在。此外，探讨宋代经学及思想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其落脚点或旨趣的探究，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宋代经学，即使是汉代经学、清代经学乃至近现代经学都同样面临这个重要问题。毕竟，作为传统儒家学者，明道、传道只是其人生意义的一部分，而行道才是关键。行道对于宋儒来说，并不仅仅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那样参政议政，“得君行道”，还充分体现在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融入经学注解之中，从而影响他人或者以待来者。这些思想不只包括其对经学的意义、“性与天道”的理解、政治

的建议等等。由此也可以说，宋代的经学解释充满了对现实的关切，其解释充满了现实的针对性。

本书的全部章节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注重从宏观上来探讨经学宋学范式的发生、特质及相关学派、重要经学门类的传承与演变。下编是从具体角度对不同学派、不同代表学者、经学著述的认知、解释的方法及思想建构等问题进行分析。这些篇章都集中于对宋代经学中具有典型性问题、儒者、学派与著述的分析，以期实现对宋代经学及其思想有更加宏观而具体的了解。总之，我们希望从不同角度对宋学范式作以分析、解释，借此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宋学范式的形成，它不仅是形式上的义理化、思想化，还在经典诠释与思想建构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革，而且这些经学变革不仅对宋学范式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还对理解宋代文学、史学的范式变革有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

就上编的各章要点而言，第一章“文化视野下的经学诠释及汉宋范式”侧重从经学本身的起源、孔子经学范式及其所奠定的汉宋两种范式角度出发，探究中国经学范式所具有的思想文化意义。第二章“新旧《五代史》异同与汉宋经学的范式转换”以两部正史的分析为基础，来说明北宋中前期史学叙事的不同实际上是唐宋社会变革与思想转型、经学范式转化下的差异。第三章“从汉学到宋学：基于二程的宋学范式转化”则重点探讨宋学范式的一些基本特征、特质所在。第四章“宋代的古文运动、经学思想与文学观”则探讨了宋代文道观的演变与经学观念变迁之间内在关联性，我们认为宋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无疑是唐宋经学转型下的产物。第五章“新学、洛学派经学在高宗时代的交锋与消长”集中探讨了南宋高宗时期最有影响的两大经学流派——新学、洛学之间随着政治的变动而彼此消长的史实。第六章“宋代‘四书’学的发生、发展与演进历程”则探讨了宋代最重要经学组成部分——“四书”学的发展、传承、演进及其意义。第七章“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诠释与演进”从宏观上对浙东学派中重要的一支——永嘉学派的产生、思想转型及其传承、演变做了探讨。第八章“宋代永嘉学派经学诠释的思想与方法”则从微观上对永嘉学派经学解释的思想与方法做了考察。

就下编的各章要点而言，第一章“刘牧图书易学易学的传承、诠释及影响探析”探讨了在宋代影响甚大的刘牧易学的渊源、解释特征、思想建构及其深远影响。第二章“道学政：程颐的易学诠释及其王道政治理念”分析了程颐易学与其内圣外王之道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来考察宋代理学化易学所建构的德性政治观念。第三章“邵雍、程颐的易学诠释及思想之比较”探讨了象数与义理易学两派代表邵雍、程颐在易学认知、诠释与思想建构方面的异同。第四章“二程经学诠释学的特征与思想旨趣”集中分析了经学宋学范式的奠基人——二程在经学解释上的思想、方法与旨趣。第五章“胡安国对《春秋》的表彰、诠释与思想”分析了作为宋学《春秋》典范之作的《春秋传》的解经思想与特质。第六章“以史证《易》：李光易学诠释与思想”分析了易学史上“史事宗”的代表李光如何将历史史实融入易学解释之中及其“以史证易”的本质内涵。第七章“吕祖谦的经学传承、诠释与思想建构”则分析了宋代浙东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吕祖谦经学的思想渊源、解释方法及思想体系的建构。第八章“朱熹与程颐易学认知、诠释及思想异同”分析了对中国近世影响最大的程朱两家在易学认知、解释方法与思想建构方面的异同。第九章“杨简经学的学术渊源、诠释与心学思想”分析了陆九渊心学最重要的弟子杨简经学的思想渊源、解释方法与思想建构。

总之，对于宋代经学及思想的研究，我们基于古文献学、学术思想史，结合前贤时哲在观念史、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将经学传承、诠释方法、思想建构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相结合，来探究宋代经学及思想的传承、发展与演变，进而分析经学在社会文化变迁中所彰显的价值与意义，最终实现对经学的本质和价值的深刻理解。总之，“轴心时代”的孔子将王官之学转化为了儒学，从而实现了六经诠释学史上的范式转换。随后，在汉代、宋代又相继产生了新的经学范式，其中宋学范式的意义不仅仅是经学的范式转换，更是一次中华文化、文明与印度文化、文明交流碰撞、融通后的文化转型，亦即宋型文化的诞生，进而影响了近世数百年。换言之，中国近世文化的核心是宋型文化，而宋型文化的核心是理学，而理学的基础是经学。我们希望从经学入手，旨在探究中国近世以来文化的真谛所在。

# 目 录

## CONTENTS

### | 上 编 |

#### 第一章 文化史视野下的经学诠释及汉宋范式 / 3

- 一 中华文化与六经的产生及其意义的奠定 / 3
  - 二 孔子重塑六经意义及经学新时代的开启 / 7
  - 三 汉、宋分别是不同文化类型的经学范式 / 10
- 结 语 / 14

#### 第二章 新旧《五代史》异同与汉宋经学的范式转换 / 16

- 一 新旧《五代史》作者、成书之间的异同 / 17
  - 二 编纂体例上的因袭墨守与会通创新 / 19
  - 三 史料文献的“繁猥失实”与“广博精审” / 22
  - 四 叙事风格上的平淡无奇与《春秋》笔法 / 25
  - 五 两史的思想差异与北宋中前期经学的转型 / 28
- 结 语 / 32

#### 第三章 从汉学到宋学：基于二程的宋学范式转换 / 34

- 一 由“五经”及“四书”：经典诠释重心的转移 / 34
- 二 “考据”与“性理”：经典诠释与理论建构的张力 / 39



- 三 从“礼”到“理”：儒家经典诠释内涵的转变 / 46
- 结 语 / 49

#### 第四章 宋代的古文运动、经学思想与文学观 / 51

- 一 宋代文道关系认知与二程的文道观 / 51
- 二 古文运动、经学复兴与“以道统文” / 56
- 结 语 / 60

#### 第五章 新学、洛学派经学在高宗时代的交锋与消长 / 63

- 一 二程洛学学派的传承、传播及蓬勃发展 / 64
- 二 两宋之际新学的衰微与洛学的重视及兴起 / 67
- 三 赵鼎、张浚的执政与二程洛学的兴盛 / 76
- 结 语 / 79

#### 第六章 宋代“四书学”的产生、发展与演进历程 / 81

- 一 北宋中期前“四书学”的发展 / 82
- 二 二程与宋代“四书学”的奠基 / 88
- 三 宋代“四书学”的发展与演进 / 94
- 四 朱熹与宋代“四书学”地位的确立 / 99
- 结 语 / 103

#### 第七章 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诠释与演进 / 107

- 一 庆、元诸先生与永嘉学的兴起 / 107
- 二 乾、淳之际永嘉之学的经学转向 / 112
- 三 陈傅良、叶适与永嘉学的确立 / 115
- 结 语 / 119

#### 第八章 宋代永嘉学派经学诠释的思想与方法 / 122

- 一 以义理解经，强调经制事功之学 / 122
- 二 推尊“六经”之学，尤重三“礼”学 / 126

三 经史兼重与“六经皆史”的提出 / 131

结 语 / 134

## | 下 编 |

### 第一章 刘牧图书易学的传承、诠释及影响探析 / 139

一 刘牧暨宋初图书易学的渊源与传承问题 / 140

二 刘牧图书易学的特征及其对宇宙本体的探讨 / 146

三 刘牧图书易学对宋代及后世之深远影响 / 154

结 语 / 161

### 第二章 道学政：程颐的易学诠释及其王道政治理念 / 165

一 社会结构演变及“格君心之非”的提出 / 165

二 新“内圣外王”之王道理念的思想内涵 / 171

三 程颐易学诠释下的“治道”观念及其影响 / 178

结 语 / 183

### 第三章 邵雍、程颐的易学诠释及思想之比较 / 186

一 图数、义理：易学认识与诠释之同异 / 186

二 “数”与“理”：易学诠释与新儒学建构 / 194

三 邵雍、程颐在易学诠释旨趣上的异同 / 201

结 语 / 206

### 第四章 二程经学诠释学的特征与思想旨趣 / 209

一 二程经典诠释学的历史情境 / 209

二 诠释循环：本义—本意—己意—本义 / 213

三 道德形上学重建的诠释向度 / 217

四 诠释的旨归：“内圣外王”之道 / 220

结 语 / 223

第五章 胡安国对《春秋》的表彰、诠释与思想 / 225

- 一 表彰二程之学与《春秋传》撰写 / 226
- 二 凸显《春秋》大义，明“尊王攘夷”之旨 / 231
- 三 以理学解《春秋》，“因经明理”以致用 / 235
- 结 语 / 241

第六章 以史证《易》：李光易学诠释与思想 / 244

- 一 李光与《读易详说》的编纂 / 244
- 二 以史证《易》：鉴往昭来 / 247
- 三 易学特点及其思想旨趣 / 251
- 结 语 / 254

第七章 吕祖谦的经学传承、诠释与思想建构 / 257

- 一 经学传承强调“不名一家”，博采众长 / 258
- 二 注重用理学解读经典，兼及考据之学 / 263
- 三 推重“左传学”，以史证经、经史合一 / 267
- 四 兼收并蓄，折中朱、陆、浙三家之说 / 277
- 结 语 / 281

第八章 朱熹与程颐易学认知、诠释及思想异同 / 285

- 一 明道与卜筮：关于《周易》性质的认识 / 287
- 二 经传关系：易学诠释原则与方法上的分歧 / 296
- 三 体用之间：易学诠释与理学建构的异同 / 303
- 结 语 / 308

第九章 杨简经学的学术渊源、诠释与心学思想 / 312

- 一 “性即心，心即道”：学本陆九渊，直承孔、孟 / 313
- 二 “不可只读纸上语”：以心解经，义理注疏兼备 / 318
- 三 “未尝舍心以立说”，儒家经典诠释与心学建构 / 322
- 结 语 / 327

---

上 编



# 第一章

## 文化史视野下的经学 诠释及汉宋范式

经学作为儒学的表现形态，它奠基于商周，而形成于孔子。它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更在文化变迁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深受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引导、塑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状态。也就是说，作为意识形态最基本展现的经学，它与社会文化之间始终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关系。汉学、宋学、新学（近代以来）作为经学最基本的存在范式，正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发生着范式转换，这种转换本身实则是思想文化体系的转变。所以，这种范式存在及其转换既不是单一性的，也不是一维性的，而是多元的、互相转换的。以往学者着眼于孔子之后尤其是汉以后的经学，注重对汉宋两种经学范式特征的关注与总结，而略于对经学及其范式特征内在原因的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个不足，值得关注。

### 一 中华文化与六经的产生 及其意义的奠定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一部儒学发展史可以说是经学阐释史”<sup>①</sup>。作为经学的根本——六经，它不但是经学、儒学的基石，

---

<sup>①</sup> 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版，绪论，第1页。

而且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哲学、史学、文学、音乐、宗教、政治、伦理、道德等，都发源于六经。六经的起源甚早，对此，清代经学大师刘师培（1884—1920）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与概括：

六经起源甚古。自伏羲仰观俯察，作八卦以类物情。后圣有作，递有所增，合为六十四卦。而施政布令，备物利用，咸以物象为折衷。夏《易》名《连山》，商《易》名《归藏》，今皆失传，是为《易经》之始。上古之君，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言为《尚书》，动为《春秋》，故唐、虞、夏、殷咸有《尚书》，而古代史书复有三坟、五典，是为《书经》、《春秋》之始。谣谚之兴，始于太古，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虞、夏以降，咸有采诗之官。采于民间，陈于天子，以观民风，是为《诗经》之始。乐舞始于葛天，而伏羲、神农咸有乐名。至黄帝时，发明六律五音之用，而帝王易姓受命，咸作乐以示功成。故音乐之技，代有兴作，是为《乐经》之始。上古时，社会蒙昧，圣王既作，本习俗以定礼文，故唐虞之时以天地人为“三礼”，以吉、凶、军、宾、嘉为“五礼”，降及夏、殷，咸有损益，是为《礼经》之始。由是言之，上古时代之学术，奚能越六经之范围哉！特上古之六经淆乱无序，未能荟萃成编，此古代之六经所由，殊于周代之六经也。<sup>①</sup>

刘师培认为“六经起源甚古”，其中《周易》乃是伏羲“仰观俯察”作八卦、后圣“递有所增”而成。《尚书》、《春秋》乃是上古之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结果，所记之言被编为《尚书》，所记之事被编为《春秋》。《诗经》兴起于上古歌谣，虞夏之后则由朝廷采诗编辑而成。《乐经》由上古葛天、伏羲、神农、黄帝等帝王所作。《礼经》是“本习俗以定”。刘师培对于六经起源的分析，超越了古人尤其是今文学经家认为六经乃孔子所作的观点，虽然充满了神话色彩，但这种认识符合六经演进的事实，毕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时代，并在传说时代创造了自己的原初文化。

<sup>①</sup>（清）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陈居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刘师培将六经源起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建立起一种关联，是古人“神道设教”的重要体现，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追究它的真实性如何<sup>①</sup>，只是将六经视为中华民族的先民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的各种智慧的结晶。当然，根据有关夏、商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的甲骨、金文来看，商周时期已经盛行着对天神、自然、祖先的崇拜，其中殷商时期最流行“帝”，而周代更盛行“天”，由此表明当时在宗教信仰上，曾经发生过由“帝”向“天”的转变。而“帝”“天”等这些具有超越的存在，为六经中所记载的商周制度与价值提供了终极依据，并最终演变为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

可以说，商周时期已经奠定了六经所蕴含的基本思想，而六经真正被编辑、整理、研习并被列为官学，则是在西周建国之后。据《礼记·文王世子》记载：

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其中“春诵，夏弦”，分别是春诵《诗》，夏弦《乐》。秋学《礼》，而冬则读《书》。这段文献说明，《诗》《书》《礼》《乐》不仅成为西周贵族子弟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还被作为贵族子弟选优、进爵、受禄的重要依据，《礼记·王制》记载：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天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sup>①</sup> 可以参看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古史层累说”。另外，李镜池先生也说：“所谓伏羲，也并非实指其人，伏羲和上古的一些帝王如有巢、燧人、神农等，不过是学者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的程序上拟想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只代表时代。所谓伏羲作八卦，只意味着八卦的来源很古远而已。”（李镜池：《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2页。）



其中的“四术”、“四教”，都是指《诗》《书》《礼》《乐》。它们在商周时期，不仅被作为贵族子弟教育的内容，还被作为选拔、奖惩人才的重要依据。

六经中《易》与《春秋》之所以没有在西周时期被列为官学。郭伟川先生的解释比较符合情理，他认为：

西周初年，《易》仍为周天子藉龟卜以问天之工具，为王室所专秘，不欲普及。因此《易》不列学官而列于礼官，夏《连山》、商《归藏》以及周《易》，概属于《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所统，故上庠未列《易》以授诸士，可以理解。至于周初无《春秋》，盖《春秋》者，史也。周初历时未久，当时尚未成史，则无以言《春秋》。但西周中后期乃至东周，周室史官藉竹简以纪年纪事，这便是“史”，实为周之《春秋》。古本《竹简纪年》中记述自黄帝至夏、商二代，在周而言，实即古史，亦即古之《春秋》。《纪年》自武王至幽王之部分，可视为西周之《春秋》。故笔者认为，《庄子·天运篇》中，孔子、老子称为“六经”之一的《春秋》，应指西周及前代古史而言。<sup>①</sup>

《周易》作为周天子与天神沟通、祭祀万灵的重要手段，道理精微，是王权的象征，故为王室所秘藏，自然不能列入官学，与贵族子弟所分享。至于《春秋》，主要是用来记言记事，重在保存史料，周初应当保存有夏、商历史文献，但没有周代自己的历史文献用来教育子弟，如郭所说“周初历时未久，当时尚未成史，则无以言《春秋》”，何况《春秋》属于官方历史档案，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观瞻。正如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金华应氏所云：“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sup>②</sup>至于《周易》与《春秋》什么时候被列为官

<sup>①</sup> 郭伟川：《先秦六经与中国主体文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sup>②</sup>（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02页。